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巫宝三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巫宝三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巫宝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 - 5004 - 3754 - 4

I. 巫… II. 中… III. ①巫宝三 - 文集 ②经济 - 中国 - 文集
③经济思想史 - 中国 - 文集 IV. F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8272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谢 康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323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3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编者的话

巫宝三（1905—1999）原名巫味苏，江苏省句容县人。1925年入吴淞政治大学。1927年入南京中央大学。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1932年毕业后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33年至1949年先后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任助理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及南京中央大学兼职教授等。其间于1936—1938年由中央研究院派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8—1939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进修。1947—1948年受罗氏基金会资助，再度赴美，完成博士论文，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代理所长；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顾问；经济研究所顾问、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顾问；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五届中央委员、第六、七届中央常委、第二、三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第五届委员、常委、第六届委员、常委、副主席等职。

巫宝三一生致力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的学术活动和

成就，大体上可以新中国成立前后分为两个大阶段。在 1950 年代以前，主要从事中国农业经济问题和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50 年代以后，主要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他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优点是很重视联系中国经济的实际，在研究西方经济理论时，主要不是作一般的介绍和阐述，而是着眼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如他研究农业经济和总量分析的经济理论时，就是联系了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占主要地位、有别于工业化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的。在他主持的“中国国民所得”课题的研究中，更是从旧中国统计资料贫乏等实际情况出发，在充分利用一切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详细搜集和估算其他方面的材料，历时三年，才完成了《中国国民所得》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对国民所得作详备研究的著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很高的评价。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中，他强调要从编辑经济思想资料入手，在详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各种经济思想、范畴和有关思想家的经济思想，逐个进行专题研究，然后再进行综合的、系统的研究，写出各个时代的专著。同时为了充分论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丰富经济学说通史的内容，他提倡进行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主张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理论中有用的因素，以适应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建设的需要，使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

巫宝三一生著译颇丰。1950 年代以前，出版专著和译著 9 部，并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50 年代以后，编辑出版了近代和自先秦至清代多卷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等共 8 卷 9 册计 300 多万字的资料书，专著 3 部，译书 1 部，论文 40 多篇。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学者文选”的有关要求和精神，

这次收录的 15 篇论文是考虑和选择了作者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术领域里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其中发表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 3 篇，1950 年代以后的 12 篇。凡已作为专著出版的，这里就不再收入。

根据以上的考虑和要求，这里收入的论文，按其内容和写作时序，编为四组。

第一组三篇论文，均发表于 1940 年代，其中一篇是研究农业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另外两篇是关于三四十年代中国国民所得的研究。

巫宝三研究经济理论，始终立足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旧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因此他特别重视对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他的《农业与经济变动》一文，就是从落后的农业国经济的现实出发，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界的农业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并提出质疑的一篇极富创见性的论文。该文探讨了在农业国家（不同于发达的工业国）中，经济变动是如何发生的，分析了杰奉斯与漠尔的收成学说所提出的“农业丰收是成为发动经济繁荣的因素”的理论，指出它既不完全适合工业国家经济变动的实际，更不能在农业国家成立。文章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变动中的弹性需求理论，认为这一理论，也是从英美等发达工业国家立论的，而对于像中国、印度等农业国家来说，就并不适用。因为在不同农业国、不同对外贸易关系的情况下，农产品需求弹性有着种种差异，由此引起不同的经济变动。归根结底是取决于各国经济结构的不同。文章还探讨了需要线的移动问题，指出汉森教授的有关论点，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真实的，但对中国、印度等农业国则不适用。文章最后批评了凯恩斯关于经济盛衰发动于农产物存积周期的论点，但赞同熊彼得的“在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包含的资本主义部分愈小，则资本主义过程中，特殊变动所产生的影响愈小，

而外来因素则成为经济变动的主因”的观点。该文以富于理论性创见，而获中央研究院杨铨纪念奖。

由于巫宝三在研究西方经济理论时，十分重视联系中国的经济实际，在他研究农业经济和总量分析的经济过程中，发觉中国经济中存在两个突出的现实问题：一是在中国经济中，农业生产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二是要使中国经济发展，就要大量投资，而这些投资，必须从每年的国民生产中减去消费部分以后，才能获得。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就必须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国民生产（国民收入）有多少？农工商等各业在其中各占比重是多少？国民生产总额中用作消费部分有多少？剩下可用作投资部分有多少？等等。弄清这些国民经济的基本问题和数据，对于研究和制定中国财政经济的发展计划以及对国民经济各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要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需要对中国国民所得问题进行研究，这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学术领域。从1930年代末起，他就着手筹划这项工作。首先对国民所得概念的厘定和理论的阐发，进行深入的探讨，然后与汪馥荪（敬虞）、章季闵（有义）等五位研究人员一起，对中国国民所得的实况，进行前所未有的精密测量，于1945年完成《中国国民所得（1933）》一书，被列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丛刊之一，于194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国民所得作出的较为详备的研究，也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和好评。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认为此书“是对中国国民所得现有的最详备的估计。”联合国1948年出版的《各国1938—1947年国民所得的统计》中的中国部分，介绍了此书，并引用了书中的资料。此外，巫宝三还撰写了《国民所得概论》（正中书局1945年）、《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华西大学《经济学报》第1卷第1期，1944年）、《国民所得与国际

收支》(哈佛大学)《经济学季刊》,(1946年)、《中国国民所得的一个新估计》(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1946年)、《中国国民所得:1933修正》(《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2期,1947年)等一系列有关研究国民所得的著作和论文。这里收录的《中国国民所得 1933、1936、1946》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抗日战争前中国的工业和就业》一文,是巫宝三与汪馥荪(敬虞)两先生合作的成果,发表于英国《经济学季刊》1946年9月总第223期。该文在当时有关资料十分缺乏和凌乱的情况下,以极大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对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就业状况,作出了相应的估计和测算,并与英德美三国的工业生产和分配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1990年代末,日本学者久保亨和牧野文夫两教授对此评价说,该文“从总体上把握近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为探讨民国时期(1912—1949)中国工业的生产规模及其结构而进行的必要的基础工作”,“是一项令人惊叹的成果”。鉴于该文在研究中国国民所得中的重要意义,故一併收录于此。

第二组两篇论文。其中《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作用的几个问题》一文,是巫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分析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关系的一篇代表作。文章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和党的政策,首先分析了经济法则与国家制度的关系,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和三种经济形态各自在经济上的特点及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经济法则制定相应的政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利用和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其次,进一步联系几年来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成就,分析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法则,在对国民经济改造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最后文章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对整个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

和对各种经济成分所起的不同作用。全文较好地对过渡时期党的经济政策，作了理论性的阐发。另一篇《用商品生产商品》中译本前言写于1990年，该书中译本重印第3版时，它对原著的理论要点，作了简明的介绍。《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作者斯拉法（Pie Sraffa, 1898—1983）是英国剑桥学派著名经济学家。《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是他30多年研究的重要成果。此书提出的理论体系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分配理论，是剑桥学派经济理论的基石。虽然此书篇幅不大，只有98页（中译本仅96页），但它对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批判，被认为是对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第二次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此书可以说是篇幅最少，而影响力很大的一部著作。在中译本前言中，巫先生对此书的理论特点、研究方法及此书问世以来各种肯定和否定的意见，也作了简略的介绍。《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原文比较艰深，中译本的问世可以说是巫先生对学术界的又一贡献。

第三组共五篇论文。其中三篇是论述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意义的文章。另外两篇是关于中西古代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及中西经济思想交互关系的文章。

《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一文，是在十年动乱结束后，写于80年代初，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开始恢复的时期，是为了适应新时期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需要。文章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时代意义，进行了深入的阐发。首先描述了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次对这门学科中存在的三种不同的名称——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在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大小、异同上，作了分析和说明。并指出，迄今在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里，一般都只是论述欧美古代与近代的经济思想，还没有一部包括几个古老文化国家（如中东、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因此研究和出版中国在各个历

史时期的丰富的经济思想史，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丰富世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关于研究方法，作者在论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要防止用贴标签方式代替阶级分析和不作科学分析，随心所欲地评价思想家学术思想的错误倾向。最后文章论述了研究经济思想史，对于开展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关于贯彻厚今薄古原则，要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经济思想研究的指示，既要反对复古，也要反对鄙古。

在《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其意义》一文中，作者首先指出，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回答一个长期存在于学术界的问题，即“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有什么意义”？作者认为其意义就在于通过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深入探索和揭示客观史实，剖析其中的意义，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建立在对象明确，内容丰富，意义肯定的基础上，从而为弘扬中国固有文化和丰富世界经济思想史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和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对此文章回顾了在欧洲经济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形成和欧洲最早一部经济学说史的出现，相距有二百多年的时间。指出中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从未有过经济思想史著作出现，这种状况是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迟缓，经济思想一直没有冲破封建自然经济这一客观实际有关。自 50 年代末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对世界了解中国的经济思想和丰富世界经济思想通史，都有重要的意义。（2）经济思想的内涵是什么？作者认为，各个时代各个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大抵包括有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经济思想基础或出发点的哲学思想；二是对各种经济问题的见解、主张和政

策方案；三是对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内在外在关系的分析。一个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常常包含了这三个方面，而一般的思想家则往往着重表述经济思想的一个或两个方面。在我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往往以哲理和政策观点居多，而经济分析则较少。文章以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为例，深入探讨了上述经济思想的三个方面。（3）关于先秦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文章认为先秦经济思想是历史上中国经济思想的源头。它既有规范性思想，也有实证性论述。主要表现在“食”、“货”范畴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具体体现为以农为本而展开的富国富民思想，先秦的儒、墨、法各家的经济思想，都属于这种经世济民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微观经济思想方面，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商人范蠡与白圭，提出“积著之理”和“趋时”、“待乏”等经商原则，它包括了商品上市的季节性规律、一般物价涨落规律、商品与货币流转原则等。此外，在农业经济方面，《管子》提出的“均地分力”论，透彻分析了在小农经济的经营中，如何提高生产积极性的各种条件，是很富有理论意义的微观经济分析。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先秦时代的经济思想是很丰富的，其中不乏某些卓越的经济分析，至今还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对它进行深入研究，不仅为弘扬我国固有文化所必须，对于丰富古代世界经济思想亦有必要。

作者在《中国古代分析论著述要》一文中，有针对性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具有经济分析性的论著，据以反驳某些西方经济学者所谓东方经济思想中缺乏科学分析内容之谬见。全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规范性经济思想与分析论证性经济思想的相互联系与区别。指出前者在于回答“应当如何”的问题，后者在于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二者往往并存于一个经济学说中。在古代由于自然经济处于统治地位，经济关系比

较单纯，经济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因此，经济思想的论著，以规范性论述居多，分析性的经济学说很少，这在西方古代亦是如此。在中国古代绝不是没有构成理论的经济分析，而是人们缺乏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第二部分作者列举了先秦以来有典型意义的六个经济分析理论：（1）孙武对农业生产与赋税及土地制度关系的定量分析。（2）管仲的“相地而衰征”的租税差等理论的分析。（3）荀子《富国论》中对欲与求、分工分职、财货本末源流等所作的杰出的经济分析和论证。（4）孟子的社会分工与交换劳动的理论分析。（5）孔颢提出的铸币“不惜铜爱工”的原则和“钱货既均”的理论，对货币价值论所作的探讨及丘浚对货币价值论的进一步分析。沈括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分析。（6）《管子》的“侈靡论”和陆揖的“禁奢辨”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所作的理论分析。

《中西古代经济思想比较绪论》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影响问题的考释》是作者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里，贯通中西方经济思想研究、颇富于创见性的两篇论文。在《绪论》中作者指出，对中西方经济思想作比较研究，其目的在于阐明两者的共同性与各自的特点，尤其是后者。为此，文章以中国的西周至战国时期（前 11 世纪至前 221 年）与古希腊罗马（前 12 世纪荷马时代至前 5 世纪罗马帝国灭亡），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

（1）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发展的异同：①两者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和生产力的发展方面，都颇为相通。但在土地关系上则很不相同。古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土地私有，直接生产者奴隶；而古代中国，土地分封为公侯贵族所有，直接生产者是有农具的小私有经济，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劳动地租和实物地租。②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都早

已产生。但两者在各自社会中发达的程度不同。古代中国是内陆国家，古希腊罗马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有繁茂的航运和国内外贸易，其商品货币经济远较古代中国发达。^③最初两者的政权都操于土地贵族，但后来两者有很大差异。古代中国是宗法制政权与土地所有制结成统一体，后来由兼併战争而演化为绝对君权的官僚制度，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多依附于贵族和封建统治者，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力量。而古希腊罗马在梭伦改革后，公民都享有政治权利，工商业富有阶层得参与政权。

(2) 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的异同：①古代思想家的经济思想，都以哲学、政治思想为基础，这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提出的经济问题和作出的论述有所不同。②两者都把农业生产放在首位。但在中国，重农思想主要是从国家和君主的富强出发，发展成为重农抑工商的政策和理论，而在古希腊罗马则主要是从奴隶主大农庄的利益出发，没有形成为抑制工商业的政策和理论。

(3) 古代中国所特有的经济思想。如对封建经济问题的理论分析以及封建主义的功利思想、租赋思想、富国思想等。

在《考释》一文中，作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如何和为何对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产生影响的问题，作了迄今最为详尽的考察和分析。文章从三个方面作了考释：(1) 中国学术思想在法国的传播：文章考察了 16 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化学术交流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学术思想在法国传播的情况。(2) 自然秩序论与天道论：魁奈继承了欧洲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特别是 17—18 世纪以来反宗教蒙昧主义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自然法思想。认为自由和理性是自然秩序最重要的内涵，从而把自然法思想作为其整个学说的基础。而中国儒家的天道观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制度，被重农学

派认为是符合于自然秩序的自然法思想，因而加以认同和推崇。

(3) 重农学派与古代中国经济思想之异同：两者都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本源，是社会生存的基础。但法国重农学派认为工商业对农产品加工及农产品的流通是社会所必需的，因而主张给工商业发展以一切便利，取消各种限制，不征工商税。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则强调抑制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两者根本不同点。最后，文章探讨了古代中国的重农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认为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思想，渊源于欧洲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以来的学术思想，并非是接受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结果。但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确是对重农学派思想产生了某种推动力，为其经济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与法国的重农理论体系，在外观上相合，而与理论实质则无何联系。

第四组共五篇论文，其中两篇是综论性的专题研究，另外三篇是对各别思想家经济思想的探讨。

《我国先秦时代租赋思想的探讨》是一篇专题研究论文。作者认为租赋思想是我国古代最重要最突出的经济思想之一，自先秦至整个封建时代，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探讨租赋思想，离不开田制和税制，因此其范围较单纯从财政学来论述为广。文章首先从西周铜器铭文探讨了“租”的概念的起源。接着考察了《国语》和《管子》中有关管仲改革租赋制度的论述，揭示了这一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进步意义。其后《禹贡》发展了管仲的租赋思想，而在《周礼》中则有更大更丰富的发展。作者认为管仲、《管子》、《禹贡》和《周礼》的租赋思想，属同一体系，而以《周礼》为高峰。文章还就先秦各派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墨子、孙武、李悝、商鞅、孟轲、荀况等的租赋思想一一作出了分析。最后文章就中国古代租赋思想的特点与古希腊罗马作了比较分析，指出，古希腊罗马也很重视农业，但在各种有关农业经济的论著

中，很少有关地租的论述。这是由于古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奴隶没有私有经济，也就不会有地租问题的出现。虽然奴隶社会也有自耕农和隶农要交地租，但它不构成社会的主要经济问题，所以并无思想家去重视和论述这个问题。到了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领地内，有公田私田之分，实行劳动地租。13世纪后，公田分与农奴耕种，实行实物地租，与中国先秦时代的土地制度颇为相似。但由于欧洲在神学统治下，没有能出现像中国先秦时那样各派思想家的论述。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中国古代租赋思想，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管子〉的封建社会国家经济论》这篇专题论文，是《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一书中的一篇总论，是作者长期研究管子经济思想具有总结性的一篇论著。作者认为《管子》一书的特点，就在于非成书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战国秦汉多家多方面思想的总汇。其经济思想的产生，一是源于管仲治国功业及其政策思想；二是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变革所产生的思潮。为了真实地反映和理解《管子》的经济思想，作者认为必须根据《管子》原著自身的拓点去整理和考察其经济思想理论，避免套用近代的经济理论。所以论文在整个研究分析中，没有采用生产、交换、分配这样一些近代的经济理论范畴，而是按原著固有的思想表述方式，将《管子》一书的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方面：

(1) 务本论、富国论。《管子》对农业财富的重视和对富国问题的论述，较其它法家更全面而具体。其对物质财富的理解，与现代国民财富论相近。其富国论介于商韩法家与儒家之间，而略近于商韩。

(2) 欲利论。《管子》的欲利论，接近于法家而兼取儒家礼义之说，主张刑赏与教化并用。

(3) 务本饬末论。《管子》重本，并主张禁末产，但同时极其